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与竞争格局

■ 孙杰/文

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过去了四年，尽管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率在2009年底就已经普遍反弹到了危机前的水平，但是时至今日，全球经济复苏依然缓慢，金融危机的各种后遗症也依然威胁着当前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这次危机给各国经济造成的结构冲击是深刻的，影响是深远的，挑战则是严峻的。

后金融危机时代 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

虽然金融危机本身造成的冲击已经过去，但是，危机带来的沉重的政府债务负担、长期结构性失业等问题再加上老龄化的来临和全球经济“日本化”的趋势，构成了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挑战。

一、沉重的政府债务负担

按照著名经济学家莱因哈特(Reinhart)和罗格夫(Rogoff)(2008)对金融危机历史经验的分析，金融危机之后通常会跟着发生政府债务危机，但二者之间一般有着数年的间隔，最长可达10年，“危机已经过去”的美好想法往往被随后的政府债务危机打破。因此他们断言，这次也没有什么不同！果真后来发生的事实不幸被他们言中，而且间隔时间仅仅为一年。从目前的情况看，其对全球经济稳定的威胁几乎等同金融危机本身，成为可能导致二次衰退的最大因素。

从表面现象看，政府债务危机是危机以后各国政府推出强力经济刺激计划的必然结果，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此前政府债务没有逐渐累积到一定程度，那么危机后的经济刺激计划可能也不会导致如此严重的政府债务负担。特别是希腊，长期以来几乎达到极限的高福利政策和低下的劳动生产率结合在一起，使得本来就已经捉襟见肘的政府财政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最终引发了危机。

如果我们把眼光看得更长远一些，就会发现一个更深层次的挑战。二战以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盛行，政府宏观经济调节成了一种常规性的反周期政策。时松时紧的财政政策导致政府公共债务存量逐渐上升。在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后，美、欧、日都出现了政府债务负担沉重，以致难以为继的局面。这意味着60多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理论本身到此时已经失去了继续推行下去的经济基础，是需要对宏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进行彻底反思和调整的时候了。

从长期角度看，西方国家财政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直接表现在财政上就是用于社会保障和医疗的开支增加。以美国为例，按照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计，医疗开支占GDP的比重将从2012年的5%上升到2037年的10%。这将是一个更加沉重的压力，迫使各国政府

必须在此之前先处理好财政问题。

二、持续的结构性高失业

当前世界经济的另一个挑战就是持续的高失业。目前，欧元区的失业率已经超过了11%，一直以低失业率著称的日本失业率也持续处于历史高点的位置，美国高失业的持续时间也创下了战后的纪录。判断当前世界主要西方国家失业状况的一个核心是，失业问题究竟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因为如果是周期性的，那么连续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就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是结构性的，则连续的量化宽松政策意义就不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改善就业状况的关键在于加强劳动力供给结构适应经济结构变化的灵活程度，加强劳动培训和教育转型等。

本文认为当前的失业问题表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当前的复苏属于无就业的复苏。按照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复苏一定会带来就业的增长。但是以美国为例，经济增长在2009年底反弹到高点以后已经维持了将近三年的正增长，而失业率却一直维持高位，说明当前的经济增长出现了结构变化，原来的劳动力已经不能满足新的要求，才造成了有复苏无就业的局面。事实上，在美国存在大量失业的情况下，美国非农部门的岗位空缺却从2009年7月的218.6万个上升到2012年6月的372.2万个。大量失业与岗位空缺同时并存，明确



继年初世界银行将明年两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大幅下调至2.5%和3.1%之后，10月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一步下调明年两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显示国际社会对全球经济前景走势的担忧。图为世界银行总部大楼。

说明当前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在结构上出现的错配。另外，从失业持续时间的结构看，正是在2009年底经济反弹达到高点以后，长期失业的比重才达到40%的高点并且一直维持至今。这说明长期失业本身与经济复苏无关，而恰恰说明正是因为经济结构转型造成的复苏，长期失业才越来越严重。

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危机时代各国推出的各种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的全球经济竞争策略不仅不会使失业状况好转，甚至还会使当时的失业状况进一步恶化，呈现出一种两难。高失业的长期存在会影响社会稳定和

经济增长，而推动经济增长的竞争策略又很可能会延缓就业市场的好转。

大选与经济政策的调整

沉重的政府债务、长期的结构性失业伴随着流动性过剩和长期经济低迷，使得世界经济形势越来越与泡沫经济崩溃以后的日本经济形势相似，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全球经济“日本化”的倾向。如何进行政策调整以应对挑战成为各国政府的关注点，而近年普遍进行的大选为不同政策主张提供了参政议政的机会，增加了不确定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2012年举行选举的国家和地区按购买力平

价计算的GDP总和超过世界经济总量的50%，因此各国选举结果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势。

2013年，美国政府多项减税政策和刺激政策即将到期，美国政府面临财政支出大幅减少、税收收入大幅增加的现象。这种急剧的变化可能导致经济增速放缓，甚至是陷入二次衰退，因而被称为财政悬崖。从目前的情况看，奥巴马可能更倾向于减少税收优惠，而罗姆尼将更多地延续税收优惠。如果奥巴马获胜，由于财政减赤，两党很可能在2012年年底之前就上调债务上限达成共识。而如果罗姆尼入主白宫，两党无法就“财政悬崖”达成共识，政府与国会之间在美国债务上限的危机可能又会重演。

2012年5月当选的法国总统奥朗德认为，欧盟内部现有的紧缩方案由于缺乏经济刺激措施的配合，将会导致经济活力的减弱，减少国家税收，从而影响削减财政赤字的效果。因此奥朗德的胜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法国民众反对紧缩政策、寻求经济增长的呼声。但是默克尔则认为，这些提议是对德国一贯主张的加强财政纪律约束提出的挑战，并可能引发其他已签署财政契约的欧盟国家放弃紧缩财政政策，对默克尔在应对欧债危机中的领导作用也构成威胁，因此可能影响到法德关系的未来发展，以及欧债危机的最终解决。

更重要的是，在2013年的德国大选中如果默克尔失利，将会使原本举步维艰的欧洲合作充满更多变数，欧元区财政一体化面临的不确定性将大大增加。此外，2013年意大利大选也将对欧债危机和欧洲经济走向带来影响。

后危机时期各国加强经济竞争力的新政策

面对危机以后出现的一系列挑战，各国政府对症下药，纷纷在实施短期经济刺激政策的同时，根据自身的问题和特点推出了各自的长期结构调整政策，以加强自身在全球的经济竞争能力。

一、美国的再工业化、出口倍增和新能源政策的调整

2010年3月，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国家出口倡议”，核心是用五年时间使出口规模翻倍，使已经完成“金融化”的美国重新依靠制造业实现再工业化，实现经济增长，同时解决最令美国政府头疼的失业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以自由市场经济著称的美国，政府很少发布带有具体目标的经济计划，而“国家出口倡议”不仅由美国总统直接牵头，更成立了由其直接管理的“出口促进内阁”，涉及美国所有重要经济部门和对外部门。2010年9月，“出口促进内阁”提交了具体实施措施的四个重点：“再工业化”提升制造业的出口能力；帮助美国中小企业扩大对外出口，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政府将通过金融和宣传等措施，帮助美国企业锁定、建立和赢得新兴市场；扩大双边与多边贸易谈判，减少贸易壁垒。

单从数据上看，在2010年美国“国家出口倡议”的实施效果不错，不过2012年由于受到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拖累，美国的出口受到了明显的影响。但是这种情况可能加快美国依托其在高技术产业的优势推动出口的步伐。

美国提高竞争力的另一个动向是能源政策的调整。长期以来，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是美国的主体能源，核

能和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很低。即使在新世纪以后受到政策推动，新能源研发投入增加，但是能源消费结构也没有明显的变化。2008年奥巴马政府提出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开发，力争摆脱化石能源的能源政策，但是至今依然是投入巨大而成效甚微。针对近年非常规勘探开发技术的逐步积累、成熟和推广应用使页岩气和页岩油开发成为现实的背景，美国可能采取更加实用的态度，放缓对新能源的投入，而是更强调对传统能源的开发和提高使用效率。这无疑也是建立在美国能源开采与利用新技术优势的基础上的。当前，北美市场的天然气价格已经大幅度下降，西德克萨斯原油指数与北海布伦特原油指数之间的持续价差就说明了这种优势。能源生产的优势可能成为减缓美国失业、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逆差的一个重要手段。

二、经济一体化成为潮流

与美国相比，欧洲处于主权债务危机的漩涡中心。有观点认为，危机常常是给了政治家一个实施他们想做而此前没有机会做的机遇。这次欧洲的债务危机也不例外。事实上，在欧元创立以后，只有统一的货币政策而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迟早要表现出其跛足运行的缺陷。因此，在强化欧元区金融稳定和救助机制的同时，作为应对危机的长期解决措施，欧元区提出了以财政契约和银行统一监管为主线来推动深度一体化的一系列方案。加上在危机前就已经签署的《里斯本条约》，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已经成为确保欧洲在未来世界经济中地位的重要举措。

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相适应，美国在亚太地区大力推进跨太平洋战略

经济伙伴关系（TPP）的建设。TPP不仅在区域内要全面实现零关税，使区域内成员成为统一大市场，还会涉及各成员国的内政，如成员国的监管、竞争政策、经济立法、劳工标准、基础设施建设、市场透明、反贪、金融业改革和产品一体化等，从而建立起高标准的区域贸易和经济合作模式。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与现有TPP成员合作的空间较小、基础较弱，如果不能吸收更多的国家加入，则发展的前景和影响力有限。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至今还没有正式加入其中。这种反常的现象可能说明美国希望借助小国确定规则，然后吸引其他国家进入，从而实现美国主导的意图，减少大国之间谈判妥协的成本。

在大国通过区域一体化来确立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竞争地位的同时，小国也没有被动等待。“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由东盟在2012年年初提出，以东盟为主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是成员间相互开放市场、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RCEP的主要成员计划包括东盟十国和六个已经与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即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RCEP的自由化程度将高于东盟与这六个国家已经分别达成的自贸协定。与高水平自由化为目标的TPP相比，RCEP将充分考虑区域内发展较慢的国家，在撤废关税等议题上给予充分的缓和安排。

三、俄罗斯的新经济

在俄罗斯总统竞选期间，普京提出推动俄罗斯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新经济”，明确指出俄罗斯需要的新经济是建立在现代技术基础上的经济，

并强调要以多元化的新经济来克服长期以来俄罗斯对燃料能源部门的依赖（正是这种依赖使得俄罗斯屡屡遭受国际市场的冲击），以高生产率和低能耗克服长期以来的效率低下，以不断实现的技术创新获得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另外，在2011年11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签署了欧亚经济委员会条约、欧亚经济一体化宣言和欧亚经济委员会工作条例三份重要文件，标志着关税同盟三国开始建立欧亚经济联盟。欧亚经济联盟的成立将是独联体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步，标志着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内经济一体化进入了实质性的新阶段。

2012年8月，俄罗斯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这也标志着俄罗斯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性竞争。普京认为，竞争是创新的根源，只有竞争才能迫使企业寻找更好的技术方案，更新产品。普京上任伊始即签署总统令，为新政府在吸引投资、发展高新技术等方面布置任务，并希望在其六年任期内提升俄罗斯在国家投资和商业环境领域竞争力的全球排名。

中国的挑战和对策

中国作为世界上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大型经济体，当前的经济增长形势也不可能脱离全球经济的走势。事实上，当前世界经济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中国在不同程度上也都存在。当然，挑战和机遇总是并存的，而能否利用机遇来迎接挑战，并借此实现长期的稳定增长，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关键则在于我们能否找准方向、突破口和发力点。

从短期因素来看，中国经济的减

速主要是因为2008年以来经济刺激政策逐渐退出所造成的，对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则使得经济减速的压力更大。当然，外部需求的下降也加剧了当前企业经营的困难。特别是在经历了2008年大幅度的经济刺激政策以后，中国企业的财务杠杆上升，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进一步下降。这种情况提示我们，所有的经济刺激政策在长期结构调整和短期增长之间无疑都偏向刺激短期增长而忽略了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刺激政策实际是在外部压力下不得不做出的短期决策。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的局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东亚经济的迅速复苏实际得益于资本流入，而非结构调整，因而当2008年危机在此到来的时候，东亚经济依然无法与欧美经济实现脱钩。所以，在当前中国经济刺激政策逐渐退出的时候，原有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甚至进一步恶化，加上欧债危机的压力带来了全球经济二次衰退的风险，使得中国经济稳定增长面临的挑战也就比2008年第一次冲击时更严峻。

从长期因素来看，按照传统柯布一道格拉斯增长模型的分析思路，在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已经很高，中国社会又会很快达到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供给增长也将放缓的情况下，要维持经济增长的唯一出路就是提高以全要素生产率为标志的技术进步，靠技术进步来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艰巨的挑战，但同时也是中国经济依靠投入发展到目前水平以后不得不应对的挑战。

2008年在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3000美元以后，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也日益明显。全球案例研究表明，能否维持经济增长速度，成功跨越中

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就在于能够依托持续的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最终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在这个意义上说，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稳定增长也是至关重要的。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劳动工资水平的提高，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竞争，美国再工业化的推进也凸显中国通过加快技术进步来维持国际竞争力的紧迫性。

当然，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全力开拓国内市场，将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转换到国内市场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从历史经验看，德国与美国的经济成长都曾经对英国的霸权地位造成威胁。由于德国的经济成长严重依靠海外市场，与英国去争夺海外市场，因此德国的崛起将英德两国推向战争。相比之下，美国之所以能和平地取代英国霸权，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独特的大国经济成长模式。在崛起过程中，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拓展国内市场。庞大的国内市场为美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国内基础，因而最终能够和平地取代了英国的霸权。随着中国经济从“引进来”发展到“走出去”，中国和平发展的压力增大。因此，中国需要改善国内收入分配，调整引资、出口和海外投资政策，大力拓展国内市场，为和平崛起提供国内基础。因此，实现中国经济从依靠外需到内需主导的转变，不仅是中国经济稳健增长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和平崛起的需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娟娟）